

19—20 世纪初匈牙利汉学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

常峻

摘要: 19—20 世纪初匈牙利汉学家如乔玛、斯坦因等对中国西藏、敦煌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中国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鲁迅、周作人等对匈牙利语言、文化、文学、族源等问题十分关注,他们之所以将眼光投向匈牙利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匈牙利汉学家的探险与考古发现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确立的推动力之一,也为汉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敦煌学与藏学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匈牙利; 汉学研究; 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

作者简介: 常峻,女,副教授,文学博士。(上海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上海,200072)

中图分类号: I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2012)06-0089-06

匈牙利地处欧洲中部,但是其民族起源与东方亚洲大陆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对自己民族起源的寻根意识强烈地灌注于匈牙利的学术研究中,使东方研究成为匈牙利科学的重要领域。其中包括藏学、敦煌学的汉学研究尤为引人注目。匈牙利汉学研究的首要方向是幅员辽阔的亚洲,因为匈牙利人古代历史事件在此发生,这就意味着关于亚洲各民族中国起源学说的研究更为重要。

19—20 世纪初,当匈牙利汉学家将目光投向中国,踏上探险考察之路时,中国的学者也对匈牙利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关注这个身处欧洲却处处流露与亚洲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互相探寻的目光相遇,中匈文化的双向交流在 20 世纪初催生了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与方向。

一、匈牙利早期汉学家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

乔玛(Korosi Csoma Sandor, 1784—1842)、斯坦因(Stein, Marc Aurel, 1862—1943)是对世界汉学有重要影响的汉学家。本节主要介绍二人对汉学的研究简况。

关于中国的匈语报道最早出现于 1760 年,但这时大多还是以西方人的方式去想象中国。直到 19 世纪,匈牙利学者先后到中国考察和探险,从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匈牙利人没有忘记自己的东方起源,迫切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揭示自己的古代历史。

乔玛是匈牙利著名的汉学家,是最早和最重要的到遥远的东方进行考察的人。乔玛出身于贫苦的塞凯伊人(Szekely)家庭,在特兰西瓦尼亚的 Nagyenyed 市的学校学习,曾做过修道院的仆役。1815 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Göttingen 留学,研习英、法、希腊、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孟加拉语等 13 种古代和现代语言。1819 年,他只身前往亚洲探险,去寻找匈牙利人的发源地。途经伊朗和阿富汗,到达印度。在西藏西部他遇到了英国旅行家和学者默尔克·洛夫特(W. Moorcroft),他建议乔玛学习藏语。1823—1831 年乔玛三次到拉达克的桑喀,向藏族喇嘛学习语言文法,阅读文献。在喜马拉雅山区寺庙中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乔玛坚持学习藏语和藏族文化,并编写成两本书《藏英词典》和《藏语语法》,1834 年在喀尔库特(Kalkutt)出版。这些字典对研究东方语言具有重要意义。之后他在喀尔库特的孟加拉亚洲协会工作了十

年。1842年他重返西藏,以便继续寻找匈牙利人的祖先及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部落。但最终没有完成心愿,在路上感染了疟疾,并在达尔旗林克(Dardzsiling)病逝。乔玛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著作内容涉及藏族文化的许多方面,包括辞典编纂、古籍目录、地理、藏传佛教的各派概说、藏医文献、文物等,使欧洲人第一次接触到《西藏王统记》、《青史》、《萨迦格言》、《医方四续》等典籍的名称。

乔玛开了欧洲藏文研究的先河。欧洲人翻译整本佛经,有史可考的,应从17世纪末算起。1687—1688年拉·洛贝尔(Simon de La Loubere)受法王路易十四之命出使暹罗(今泰国),返国后在1691年出版一部《暹罗王廷记》,书中收有从巴利文译出的《提婆达多本事》等节要。18世纪后,巴利文另一本主要的戒律书《羯摩文》不断有传教士翻译成意大利文、拉丁文和英文。之后,藏文佛典也开始被翻译成欧洲文字。现在课堂上正式讲述欧洲人翻译佛经的历史,是从十九世纪初匈牙利人乔玛、德裔俄国人修弥笃(Isaak Jakob Schmidt)和法国人皮优奴(Eugene Burnouf)算起。

1877至1880年,在乔玛只身一人探险考察之后近半个世纪,Szechenyi Bela伯爵组织了到东亚的第一次探险。这次探险获得了成功和国际认可,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Loczy Lajos)在地质、古生物学和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探险队还为出版旅行指南收集资料,学者、目击者的旅行日志,文章、报道增进了匈牙利读者对中国的了解。

本世纪初,最重要、最轰动、同时也是最令中国学者痛心的探险考古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的西域探险。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北面的中国及中亚地区,研究曾经繁荣的土耳其斯坦(原苏联)绿洲上的文化古迹、敦煌千佛洞窟的宝藏,解释了许多与“丝绸之路”相关的问题。他在一系列英文专题著作中介绍了自己的旅行及所取得的成就。

斯坦因1862年11月26日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让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先后就读于德累斯顿、维也纳、莱比锡和土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学会了德语、英语、梵文和波斯语,还接触了希腊文和拉丁文。1883年获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印欧语言学和宗教史教授R·V.罗斯(1821—1895)。1884—1886年在伦敦牛津和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后,研究东方语言学和考古学,其间在匈牙利参加义务军训一年,掌握地形测量和制图技术。1888年,26岁的斯坦因出任英属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直到1899年。1910—1929年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1912年被英国封为爵士。受英属印度政府委托,四次赴中亚探险(1900—1901,1906—1908,1913—1916,1930)。从1900年起,先后四次对我国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等地进行了探险考察,大肆盗掘和掠夺中国文物,把大量中国文物劫运到英国。尤其是他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劫掠,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他劫走莫高窟经洞中万余卷古文书和数百幅绢画、新疆各遗址出土的古代壁画、泥塑、木雕和古文书等;第三次探险劫去西夏、汉、藏、回鹘文文书和丝织品无数,途中即送走141箱文物。早在1902年,斯坦因就从他的同乡好友、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那里听说过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所以考察敦煌石窟就成了他早期重要的探险计划之一。

“余因阅览古迹故,遂至敦煌。当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济Loczy教授,曾随伯爵斯布尼Count Szechenyi之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语余,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美,冠绝东方,余深感其语,故有敦煌之行。”^[1]

1906年4月20日,由八人组成的斯坦因考察团从印度出发,越过帕米尔高原后来到中国新疆。此时的斯坦因因为自己不懂汉语而非常苦恼,恰巧一位师爷蒋孝琬旅居喀什,斯坦因就聘请他作为中文翻译和工作助手。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第一次到达敦煌。^[2]斯坦因写下了《古和阗考》、《沙埋和阗废墟记》、《西域考古图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考古报告和著作。因此,他获得英国、法国、瑞典、匈牙利、美国等国的地理学会和占物学会颁发的各种荣誉和奖励,被当代西方史学家欧文·拉提摩尔誉为“他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

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3]他共有著述四十余种,其中不少为巨著,论证了古代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深远影响。两卷本《古和阗》(Ancient Khotan, 1907)是研究中亚史,尤其是中亚美术史的重要资料,该书重点记述和阗地区古代雕塑、建筑、钱币、文书简牍等,并附沙畹、弗兰克(A·H·Francke)、卜士礼、托马斯等对汉、藏、希伯来、波斯文等文书的考释;两卷本《契丹沙漠废墟》(Ruins of Desert Cathay, 1912)、《西域》(Serindia, 一译塞林迪亚, 1921)、《千佛洞》(The Thousand Buddhas, 1921)等是中亚美术史和敦煌吐鲁番学的重要资料;四卷本《亚洲腹地》(Inner Asia, 1928)和《西域考古记》(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 1932。向达的汉译本于193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尚有《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Rajatarangini)的梵文校注本和英译本、《喀布尔萨迦诸王》(The Saka Kings of Kabul)等重要著作。

1925年他把自己的1112册图书捐献给故乡匈牙利科学院,匈牙利科学院成立了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收藏品部。他在给匈牙利科学院捐献图书时写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对匈牙利的年轻时代有很深的记忆,这一记忆是和匈牙利科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我经常走访科学院图书馆的阅览室。在那里我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的东方学研究就是在那里从争论梵文而开始的。”他把自己出版的有关梵文研究的著作及时寄给了这个“辉煌图书馆”。斯坦因去世后,他在英国和印度遗产中的2300册图书、180本杂志、31本图片册和很多私人信件等,也相继运到了这里。这些遗物当中有大量的有关中亚、伊朗和印度的宝贵历史文献。为了纪念斯坦因去世50周年,匈牙利科学院出版发行了他生前最后一部著作《Old Routes of Western Iran》(《伊朗西部的古代路线》)。

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关于中亚的考察报告与研究论著是当代敦煌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他肆意窃取中国的大量珍贵文物的行为,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二、中国学者对匈牙利语言文化的关注

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学者也对遥远的匈牙利表示了极大兴趣,在多篇文章中提及。

当匈牙利汉学家在西域探险时,匈牙利迎来了第一批来自遥远东方的访问者,康有为就是其中之一,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侨居国外。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与匈牙利民族代表会面的经过。

梁启超曾赞陈寅恪“马尔扎文(匈牙利语)他都懂”,这是在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时,梁启超推荐陈寅恪(1890年—1969年)任导师(比教授高一级),是由民国政府教育部聘请,校长曹云祥提名经办。曹校长听说他不是博士,连学士、硕士的学位都没有就表示为难,梁启超却气愤地说:陈寅恪曾就读过美国的哈佛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德国的柏林大学研究院。他懂得的文字简直数不过来,诸如:英、法、德、日、俄、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巴利文,还有满文、藏文等都懂;最难得的是业已‘死亡’了的文字,如突厥文、西夏文、中亚西亚以及匈牙利的古文字都懂。可知陈寅恪对匈牙利的语言文化也有关注。

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都探讨过匈牙利的民族起源问题。章太炎在《匈奴始迁欧洲考》的文章中指出匈奴被汉军驱逐转入欧洲,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征引西方和中国史籍,详细考订北匈奴西迁欧洲经历,认为在公元4—5世纪导致欧洲民族大迁徙并建立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诸国的芬人(Huns or Fins)即“窋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4]如前所述,匈牙利人对自己的民族起源也十分关注,乔玛正是为探求民族起源问题于1819年赴西藏探险;1848年匈牙利反抗奥地利的民族革命战争,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都引起致力于民族振兴的中国先行者的敬意与赞扬,梁启超撰《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高度赞扬诗人裴多菲,周作人翻译作家育珂摩耳著的中篇小说《匈奴奇士录》、《黄蔷薇》。

《匈奴奇士录》是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JókaiMór）1877年所著的长篇小说《神是一个》（Egyaz-
Isten），英译者为倍因（RobertNisbetBain）。周作人说：“里面穿插恋爱政治，写得很是有趣。”^[5]匈牙利当时被认为是属于“弱小民族文学”的国度，育珂摩耳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匈奴奇士录》也是弘扬匈牙利民族精神之作。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与亚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匈牙利自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周作人后来曾说：“当时我们承认匈加利人是黄种，虽然在照相上看来，裴彖飞还有点像，育西加与育珂等人已显然是亚利安面貌了。但他们的名字与欧人不同，写起来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译称摩理斯育珂，而其自署则必曰育珂摩耳，这一节似乎比印度人还要更是东方的，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兴趣。”^[6]

另外，周作人在介绍“荣光之手”（Hand of Glo. Iy）的起源时，谈到生在绞刑架下的曼陀罗，引用了匈牙利小说《黄蔷薇》中的一个片断：

“女忽忆往事，尝有吉迫希妇人为之占运，酬以敝衣，妇又相告曰，倘尔欢子心渐冷落，尔欲撩之复炽者，事甚易易：可以橙汁和酒饮之，并纳此草根少许，是名胖侏儒，男子饮此，爱当复炽，将不辞毁垣越壁而从汝矣。女因念今日正可试药，以诃禁之。草根黝然，卧箱屉中，圆顶肿足，状若傀儡。……名之Atropa mandragora，至其草为毒药，则女所未知者也。”

Mandragora是曼陀罗的拉丁名，女子想以此挽回逝去的情感，重新点亮恋人逐渐消逝的爱情，使之“不辞毁垣越壁”追随自己。却不知，媚药亦是毒剂，薄情的爱人可能就此化为痴情的鬼魅，纠缠其生生世世。

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以实践其“小说革命”、“小说救国”的理论，分五期连载在《新小说》上。这是他唯一一篇小说，被称为现代中国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说。这部小说虚构了中国自1902年到1962年的政治变化。通过孔博士在1962年世博会上的回顾演讲，梁启超臆想了一个中国的建国与复兴过程。但是这本缺少文学性、如今很少被阅读的作品，却富有预见性地奠定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基调——在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时代里，中国如何建国、赢得独立与尊重。

“一九六二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召开了。会议规模惊人的庞大，不仅是上海市区，连江北、吴淞口、崇明岛都是会场，除去物品的展出，更有各种宗教与学术的交流。这一年，也是中国维新五十周年的纪念。首都南京举办盛大的庆典，英国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菲律宾、匈牙利的总统及夫人，及其他强国的钦差大臣，都前来道贺，签署了万国太平条约。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7]

在梁启超幻想的世界里，在世界列强林立的祝贺会上，特别地写出了“匈牙利”。探讨原因，这里其实是对现实的反思与追问，是匈牙利的民族独立革命对中国志士的鼓励，也有其民族东方起源的神秘的亲切感。并且，梁启超在20世纪初建立新史学，提倡宏观的世界史时，也援引匈牙利族源问题的研究。他明确提出“世界史”和“人类全体史”的概念，阐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不同意义。他认为世界各国的历史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息息相通的，犹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生动地说：“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4] (274-275)}

为论证此理论，梁启超提出“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的历史学命题。^{[5] (275)}中国历史上这些重大事件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确有着一定的影响，世界历史应从整体、综合的角度研究。

总之，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中国学者研究关注匈牙利，并在20世纪初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三、匈牙利汉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的影响

如上所述，19-20世纪初中国与匈牙利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对汉学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确立产生

了深远影响与启示。

一方面,奠定了汉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敦煌学与藏学。欧洲学者对西藏的系统研究,始于19世纪30年代,匈牙利人乔玛奠定了藏学基础。他终身致力于藏族历史、语言和宗教研究,《藏英字典》(Essay Towards a Dictionary, Tibetan and English)和《藏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in English)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他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图书馆专门设立亚历山大·乔玛(Alexander Csoma)藏学和藏文手稿收藏品部,收藏的文献包括语言学、文学理论、天文和历史等共3000多件藏文手稿和雕版文献。其中最有价值的书籍是由有学问的藏族喇嘛回答乔玛的提问。为纪念他对藏学的贡献,匈牙利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立国际性学术组织乔玛学会(The Korusi Csoma Society)。

外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以探险为名攫掠而去的一批汉晋简牍和其他珍贵文物资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斯坦因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释读和出版这批资料。沙畹对木简作了考释,在刊印这批木简释文之前,1913年将手稿寄给了寓居日本的罗振玉。当时,罗振玉和王国维正在从事刚刚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的整理释读工作,罗振玉眼光敏锐,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与王国维一起,在未见实物的情况下,面对很不清晰的图版,进行认真细致的考释和分类整理工作,四个月,出版了《流沙坠简》一书。这就是20世纪初汉晋简牍发现和研究的开始,促成了敦煌学的出现。

另一方面,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学者所发现的新的学术领域,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确立的推动力之一。陈寅恪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王国维、罗振玉也因“神物去国,惻焉疚怀”^[8]他们奋起而作《流沙坠简》一书,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购买的十多种石室遗书编订为《敦煌石室遗书》,王国维又著《简牍检署考》一文考证古代文书制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同时代学者。他们的研究不仅注重文字释读、史事考索,同时还注意利用出土实物考证古代名物制度。

中国历史上几次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大多与新材料的出现有关。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9]王国维把殷墟甲骨卜辞、西域木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敦煌藏经洞唐人文书视为“四大新史料发现”,使中国学术史有了很大的改观。1913年,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初稿中首次提出了“二重证明法”:

宋代以后,古器日出。近百年之间,燕秦赵魏齐鲁之墟,鼎彝之出,盖以千计,而殷墟甲骨乃至数万。其辞可读焉,其象可观焉。由其辞之义与文之形,参诸情事,以言古人之制,未知视晚周、秦汉人之说何如?其征信之度,固已过之矣……然则晚周、秦汉人之书遂不可信欤?曰不然!晚周、秦汉之际,去古未远,古之制度、风俗存于实事者,较存于方策者为多,故制度之书或多附会,而其中所见之名与物,不能创造也。纪事之文或加缘饰,而其附见之礼与俗,不能尽伪也。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於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也。^[10]

此后,王国维以此为例证,在其讲义《古史新证》中又一次重申了新的认识考证古史的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就是“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寅恪赞这种方法可“示来者以轻轨”,郭沫若更以为这种“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当时正是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西域考古发现也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契机之一。

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是指传统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包含多层面的内容,在学术研究主体、学术研究理念和宗旨、学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成果及交流机制、学术争鸣与成果评估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变化与差异,显示了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在此探讨匈牙利汉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视野、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上,在开眼看世界、西学

东渐的浪潮中，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以世界眼光融会中西知识体系，以实证方法重新考辨中国古史，广泛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较勘察，反复考证，既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坚持怀疑态度和批评精神，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恢复典籍原貌，建立科学的古史体系，促进中国传统史学、经学的近现代转型。“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就是近代中西学术交流以及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等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而其中敦煌文书、汉晋简牍两大发现都与匈牙利汉学家有关。

综上所述，考察19-20世纪初匈牙利汉学研究及中匈文化交流与互动，使我们了解到独特的族源探求是匈牙利人学习汉语和汉学研究的原因之一。西方汉学研究的兴起，其背景是欧洲近代大航海运动、早期传教士的宗教目的以及殖民扩张野心。但是，匈牙利汉学家乔玛不是如此，也不是为了猎奇，他是为了探求民族的根源，为了匈牙利民族的复兴而服务。在亚洲民族中他找到了亲戚和朋友，以平等的态度研究并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力求探讨不同文化形式之中包含的对全人类社会有价值的东西。乔玛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态度，也是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的原则之一；同时，由匈牙利汉学家参与奠定的敦煌学、西域考古发现又对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匈] 斯坦因. 中亚细亚探检谈 [A]. 王国维译. 王国维遗书 (第14册). 观堂译稿 (上) [C].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2.
- [2] 郭海成, 沙武田. 斯坦因与敦煌文物的劫难 [J]. 寻根, 2007 (2): 38-34.
- [3] 陆庆夫, 王冀青. 中外敦煌学家评传 [M].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302.
- [4]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A]. 王德峰编选: 梁启超文选 [C].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1: 276-277.
- [5] 周作人. 翻译小说 (下) [A]. 知堂回想录 (上) [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247.
- [6] 周作人. 匈加利小说 [A]. 书房一角 [C].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11.
- [7]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8.
- [8] 罗振玉. 流沙坠简序 [A]. 罗振玉, 王国维. 流沙坠简 [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1-2.
- [9] 王国维.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A]. 王国维遗书 (第3册). 静庵文集续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3: 699.
- [10] 罗振玉. 雪堂丛刻 (三)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0: 298-299.